



任泽平谈中国收入分配报告 2021：根源、影响与建议



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

特别鸣谢：

华炎雪、梁颖、李晓桐、毕然

实习生关尹、王嘉铭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



导读

增长与分配，效率和公平，是几百年经济思想史的两大大命题。过去几十年全球重视增长和效率、忽视分配和公平，全球贫富差距拉大，导致社会撕裂，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，占领华尔街运动等。新冠疫情后经济 K 型增长，全球过度依赖货币放水，穷人通缩、富人通胀。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引起全球重视。

近年中国高度重视收入分配，精准扶贫被列为三大攻坚战，将共同富裕纳入十四五规划，浙江省被选作共同富裕示范区。为什么从效率优先转向重视公平？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什么？根源在哪里？如何治理？继《中国收入分配报告 2021：现状与国际比较》篇之后，本文为《中国收入分配报告 2021：根源、影响与建议》篇。

摘要

根源：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全球共性原因，比如，流动性泛滥和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等；也有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的原因，比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平和效率抉择问题，三次分配调节机制不完善等。既要肯定过去收入分配制度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历史进步性，也要客观承认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。

第一，全球货币超发造成财富再分配，易加剧贫富差距。2020 年疫情冲击下，全球央行大规模货币宽松，结果是美股创新高、美国房市量价齐升、中国股市走牛、热点城市房价异动。其实，过去十多年，全球处在货币超发的，美国量化宽松，中国金融自由化。

第二，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、资本收入份额上升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。1980-2011 年，全球劳动所得份额从 64%下降到了 59%。2009-2020 年国内财产性收入占比从 2.5%提高至 8.7%；劳动性收入占比从 72.1%下降至 55.7%。2020 年财产性收入增长 6.6%，远高于工资性收入的 4.3%。

第三，国内收入差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、经济制度、所有制、分配制度的变革与转型是分不开的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收入分配思路从平均主义，到效率优先、兼顾公平，到兼顾效率和公平；贫富差距逐渐由处于低位、到持续扩大、到缓和。

回顾我国经济改革历程，大致分为 6 个阶段：1) 1949-1978 年，“平均主义”，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，但是效率低下、分配平均但不公平、缺乏激励。2) 1978-1992 年，“按劳分配”，农村实行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率先扩大。3) 1992-2002 年，效率优先、兼顾公平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，企业转制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，城市内贫富差距快速扩大；户籍制度与土地改革制度促使资源进一步向城镇集聚，城乡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。4) 2002-2012 年，逐步强调公平，农村社保体制、城乡社会救济制度不断完善，贫富差距趋于缓和，同时受益于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，经济高速增长；5) 2012-2019 年，提低、扩中，兼顾效率和公平，在就业、社保、扶贫攻坚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积极举措，贫富差距有所改善。6) 2020 年至今，更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。

第四，不完善的收入初次分配及再分配制度。中国过去劳动力供大于求、市场化程度不够、以及工会调节机构欠缺等问题，都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均衡的原因。同时，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再分配调节效果逐渐下降。如个税改革力度较轻、步伐较慢；大量财产性收入未被征税；税收征管制

度存在漏洞等。

展望：为什么未来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？改革开放之初，一穷二白，钱少人多，生产要素上劳动过剩、资本稀缺，劳动的话语权弱、资本的话语权强，为了促进增长、做大蛋糕，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优先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为基本导向，衍生了一系列对资本友好的制度，比如户籍制度、土地财政、社保制度、税收制度、地方招商等。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，“刘易斯拐点”出现，人口红利渐远，开始出现劳动稀缺、资本过剩的逆转，各大城市上演“抢人大战”，劳动的话语权提升，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，所以要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、适当抑制资本，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公平、分好蛋糕、共同富裕，要“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”、“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”、“先富带后富帮后富”、“合理调节过高收入，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”、“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”、清理校外培训、推出房产税，等等。这些都有助于双循环、扩大内需、发展实体经济、制造业、硬科技、新基建等。这就是大势，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，时代的力量。

建议：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，其对经济健康发展、社会稳定影响重大。未来调整收入分配、实现共同富裕，在更重视公平导向的同时，也要注意兼顾效率，兼顾对经济增长的激励。分好蛋糕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，不要陷入存量思维，凡事过犹不及。

我们从初次分配、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角度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
第一，初次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，注重保护劳动所得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。完善最低工资、工资支付保障、工资合理增长机制。

第二，完善再分配制度，提低扩中。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；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，兜底社会公平底线；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，继续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，探索实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；对房产的保有环节和资产的代际传承环节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。

第三，鼓励三次分配，完善配套制度。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；完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信托的监管制度，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；普及慈善意识，提高个人慈善捐赠积极性。

第四，促进就业、创业、教育、投资等不同方面的机会均等，使不同收入层级的居民均能有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。解决外来劳动力落户、子女教育、子女医疗等问题；帮扶困难群体创业和提供创业孵化的扶持；平衡区域间、城乡间教育资源，降低房产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捆绑关系；设置低门槛多样化金融产品，使更多居民可以参与到财富性收入的分配环节；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，推动城市群战略、人地挂钩、金融稳定和房产税。

正文

1 根源

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全球共性原因，比如，流动性泛滥和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等；也有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的原因，比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平和效率抉择问题，收入三次分配调节机制不完善等。既要肯定过去收入分配制度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历史进步性，也要客观承认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。

1.1 全球货币超发，资金脱实向虚

货币超发造成财富再分配，易加剧贫富差距。超发货币流入市场，造成通货膨胀和广义资产价格上升，一方面通胀挤压居民实际收入，另一方面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催生资产泡沫，资产配置结构中房产和金融资产占比高的人财富增值快，财富两极化、贫富差距扩大。

过去十多年，全球处于货币超发，美国量化宽松，中国金融自由化。全球性的货币超发带来资产价格上涨，尤其在经济的衰退期。2020 年疫情冲击下，全球央行大规模货币宽松，结果是美股创新高、美国房市量价齐升、中国股市走牛、热点城市房价异动。2020 年 4-12 月，纳斯达克和标普 500 指数均上涨 45%；上证综指、沪深 300、创业板指分别上涨 26%、41%和 59%，上海、深圳、杭州等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行。

1.2 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、资本收入份额上升

近年来，全球劳动的话语权减弱、资本的话语权增强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。在过去，全球多数经济体，包括中国的技术进步，更多地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（资本偏向型）。这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、资本收入份额上升，从而扩大了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差距。而资本要素所有者逐渐积累财富，劳动要素所有者集聚财富的能力下降，财富差距逐渐加大。

劳动收入份额下降、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现象在大部分经济体中均有出现，包括中国。国际方面，1980 年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劳动所得份额都在下降，1980-2011 年，世界范围内劳动所得份额从 64%下降到了 59%，且仍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。（L Karabarbounis, B Neiman,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, NberWorking Papers, 2013）。国内方面，财产性收入占比从 2009 年的 2.5%提高至 2020 年的 8.7%；劳动性收入占比从 2009 年的 72.1%下降至 2020 年的 55.7%。2020 年财产性收入增长 6.6%，远高于工资性收入的 4.3%和经营性收入的 1.1%。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占比从 2000 年的 22.3%上升到 2018 年的 26.0%，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占比从 2000 年的 64.9%下降到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4548

